过渡时代的思想与教育

——蒋梦麟早期教育思想的社会学解读

熊春文
(中国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094)

摘 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蒋梦麟始终是事实上的倡导者和执行者。蒋梦麟早期的教育思想轨迹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要点,其一是他逐渐获得的平民主义的核心教育思想,其二是他借以获得这一思想主张的一以贯之的社会学思维。正是基于这一思想特质,蒋梦麟能够敏锐地把握时代问题,成为新教育运动的推动者。

关键词 过渡时代; 蒋梦麟; 早期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68(2007)02-0059-22

引言:作为"新教育理论家"的蒋梦麟

论及五四运动对于中国教育转型的根本性影响,一般史家都归因于蔡元培的北大精神及其涵育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则首推胡适、陈独秀所领导的白话文改革。然而,对于教育改革而言,新文化运动内部诸同仁的贡献是各不相同的,拿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蒋梦麟四人来说,他们对于当时教育改革的作用,既有直接和间接的区别,也有方向和领域的不同。对于这种差异性,以往研究还注意的不够,以致几乎完全忽视了蒋梦麟的重要意义。

关于这一问题,胡适于 1935 年在香港作过一个题为《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的演讲,在演讲的开头他交代说:"我对于教育还是一个门外汉,并没有专门的研究。不过,我们讲文学革命,提倡用语体文,这些问题,时常与教育问题发生了关系。"[1] 胡适称自己对于教育是门外汉,我们可以看成那是他自谦的表示,但说他并不专门研究教育,这却是实话。白话文改革是从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进路触及教育问题的,在胡适及陈独秀看来,教育问题显然是隶属于更大的文化问题和思想问题的。故此,白话文教育的提倡首先是一个思想革命的

收稿日期: 2007-02-09
作者简介: 熊春文(1977—)男,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博士。

问题,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或专门的教育问题。这一方面表明,白话文改革的影响在于它的思想性和广泛性,但另一方面,白话文改革还没有触及很多教育专门问题(如教育体制、教育思想、课程、教学等),对于教育界而言,白话文改革还是外围的。恰恰在这一点上,蒋梦麟的意义凸显出来。

事实上,在新文化运动同仁中,真正专门倾力于教育研究、并对当时的教育改革产生实质影响的,蒋梦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从美国师从杜威专攻教育,到回国后积极发表教育言论,倡言教育改革,再到五四前后发起新教育运动,促成壬戌学制的制订和全面的教育改革。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蒋梦麟始终是事实上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如果说早期陈独秀和胡适对于教育问题的关注仅仅是他们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整体思想的一个部分,他们的主要心力专注于比教育更大的文化问题,那么,蒋梦麟的教育思想则是他对专门教育问题深入研究和主动抉择的结果。比起陈独秀、胡适乃至所有《新青年》同人来说,五四期间的蒋梦麟更像一个纯粹的教育理论家。不过,作为"新教育理论家"的蒋梦麟,也与当时专业研究教育思想的教育哲学家或教育史家不同,早期蒋梦麟教育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所秉持的一种典型的社会学思维。我们的研究将表明,早期蒋梦麟对某种理论或思想的阐述,总是基于对中国社会转型乃至世界形势的一个判断,并遵循社会转型—思想变革—教育变革的逻辑。这种论证逻辑从思想渊源上讲具有乃师杜威的印迹,但更多的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敏锐感知和应对策略,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正是这种社会学思维,使得蒋梦麟能够更加敏锐而准确地把握时代问题,成就其中国教育改革前沿推动者的地位。

一、身处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历程[①]

蒋梦麟(1886~1964)的成长经历典型地反映了新旧时代过渡的印迹,在这个过程中,蒋梦麟像陈独秀、胡适等人一样从预备的传统士大夫轨迹改道近代知识分子历程。而且因为他的家庭为他准备了多于常人的西潮背景,使得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交汇与矛盾更加集中地在蒋梦麟身上得以彰显。

蒋梦麟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村庄,祖父和父亲都是商人,可谓家道小康,这为他的教育提供了殷实的基础。除经济支持外,蒋梦麟所受的家庭影响是"良好而健康的"。蒋梦麟的母亲是位很有教养而且姿容美丽的女人,可惜早逝。对蒋梦麟影响最大的自然是他的父亲。父亲不仅在道德人品上为蒋梦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而且由于经商而受西方的影响,父亲在蒋梦麟的教育上始终保持了一种很开明的态度,让儿子受现代教育。后来蒋梦麟入绍兴中西学堂、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南洋公学乃至赴美留学,都跟父亲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① 本节内容除特别注明,均参自蒋梦麟著:《西潮·新潮》,长沙:岳麓书社 2000 年版。

蒋梦麟五岁入家塾，从《三字经》一直念到四书五经，最初几年教育的方法只有枯燥而又乏味的死背古书，家塾生活对他而言简直像监狱，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这种憧憬就是向往自己通过学习将来成为学者名流、达官贵人。当然，家塾教育毕竟为蒋梦麟在儒家经典的记忆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蒋梦麟从四书五经初步了解了儒家“修、齐、治、平”的做人道理。① 1897 年，蒋梦麟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接触到自然科学的知识，在中学方面更取得长足的进步。蒋梦麟后来得中秀才，最为感激的还是他在家塾和中西学堂时在四书五经方面下过的苦功。[2] 在中西学堂，蒋梦麟知道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尤其了解了甲午战争的意义，明白了中国为什么学习西洋学术；另外，与蔡元培的师生之谊也是从中西学堂开始的。

1899～1902 年，蒋梦麟先后随家辗转上海、余姚、杭州，1901 年还牵涉学潮，教育很受影响。1902 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开始真正感受到学问的兴趣。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对于中国来说是多事之秋，1894 年的中日战争，1898 年的戊戌变法，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1904 年的日俄战争，都是对学生时代的蒋梦麟的重大刺激。在省立高等学堂念书期间，蒋梦麟像所有青年一样热切关心时政，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是他们的精神食粮，孙中山及其革命派则使他们的革命情绪不断增涨。蒋梦麟对一切活动都感兴趣，他喜欢搜求消息，喜欢就所获得的资料加以思考分析，喜欢使自己感情奔放，参加行动。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同样对他影响至深，使他能够在革命的情绪和行动上做到适可而止，并认为除了革命，科举仍旧是做官的不二途径。于是，蒋于 1903 年回绍兴参加郡试，录取为余姚县学附生。同年又回到杭州，接受新式教育。蒋梦麟就这样在新旧两个世界来回穿梭，恍若隔世，一度造成精神紧张：满脑子矛盾的思想，新与旧的冲突、立宪与革命的冲突简直使尚未成熟的心灵无法忍受。这种紧张是由疯狂的时代和社会造成的。

与愈来愈多的直接投身革命运动的热血青年不同，蒋梦麟最终决心接受更为西化的教育。他认识到不论立宪维新或者革命，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而且与大多数主张通过日本接受西洋文明的人不同，蒋主张直接向西方学习。因此，他于 1904 年考入南洋公学，以便为留学美国打基础。蒋梦麟在南洋公学一直读到 1908 年自费留美，期间曾赴日本做过一次短暂旅行，对日本的强迫教育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这或许就是使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所在，并声称后来赴美学教育，也受这些感想的指示。南洋期间，蒋温习了四书，开始研究宋明哲学，有意比较中西贤哲在所有问题上的见解，不知不觉地做了一项东西道德行为标准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最重要的结果是学到了如何在道理观念中

① 蒋梦麟还回忆说：“在老式私塾里死背古书似乎乏味又愚蠢，但是背古书倒也有背古书的好处。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事的指南针。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一切守旧成风，行为的准则也很少变化。因此我觉得我国的老式教学方法似乎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需要。”

区别重要的与不重要的、基本的与浮面的东西。蒋梦麟开始了解东西方的整体性,体会到宋儒陆象山所说的"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开始体会到紊乱中的统一,发现基本的原理原极有限,了解这些基本原理之间的异同矛盾可以互相发明,互相印证;赞同孟子和陆象山"做学问要抓住要点而舍弃细节,要完全凭我们的理智辨别是非"的观点。这些实际上已经预示了他将来留美期间进行教育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内容。

1908 年 8 月,蒋梦麟负笈西行,翌年入加州大学农学院。读了半年农科之后,经友人劝阻和自己的反复考虑,他认为只有育人才能救国,毅然转入社会科学院,选教育为主科,历史与哲学为附科。从 1909 年秋天起,蒋梦麟开始选修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和英国史,大学生涯步入正途。在这些课程中,蒋对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是将它们与中国思想进行比较,相互发明,求同存异,他说:

> 对于欧美的东西,我总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这就是从已知到未知的办法。根据过去的经验,利用过去的经验获得新经验也就是获得新知识的正途。……他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根据这种推力,我觉得自己在国内求学时,常常为读经史子集而深夜不眠,这种苦功总算没有白费,我现在之所以能够吸收、消化西洋思想,完全是这些苦功的结果。我想,我今后的工作就是找出中国究竟缺少些什么,然后向西方吸收所需要的东西。[3]

正是基于这种严谨而又宏远的学术志向,1912 年,蒋梦麟毕业于加州大学教育系后,旋即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从学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在哥大,蒋梦麟学到如何以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现象,并体会到科学研究的精神,这使他得以将长久以来的学术志向付诸实施。在杜威等人的指导下,蒋于 1917 年完成论文《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A Study in Chines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获哲学与教育学博士学位。他在这篇论文中所达到的成就我们将在下文加以探讨,这里只需指出,蒋在同年回国后,立即被聘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参与《教育杂志》的编务工作,同时兼任江苏省教育会理事。凭借他的学术功底和教育观点,蒋梦麟很快确立了他的新教育理论家的地位。

二、《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①

关于蒋梦麟的教育思想,以往的教育(思想)史著作一般只注意蒋梦麟在《教育杂志》和《新教育》上表达的观点以及他长北大时的教育实践,实际上,蒋

① 本节内容除特别注明,均参自 Monlin Chiang, *A Study in Chines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Commercial Press, Shanghai, 1918.

梦麟教育思想的精髓已经在《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中得到了最详尽的阐述，蒋梦麟后来的教育论述几乎都可以从这部著作当中找到思想渊源。①

在这部著作中，蒋梦麟从三个方面来展开他的研究：第一部分描述中国教育的思想背景和一般范畴，力图把握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精神；第二部分从人性论、学习、教学和道德教育四个方面对中国教育原理进行细致的梳理，并在各个方面与西方教育传统做比较；第三部分，在梳理和比较的基础上，蒋梦麟提出了他关于中国教育的新主张。我们能够看到，贯穿其研究的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学思维。

（一）中国教育的背景与一般范畴

可能受杜威的影响，蒋梦麟开篇就讲“教育即生活和思想的方法，生活和思想即教育的内容。”[4] 因此，蒋梦麟从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两个方面来考察中国教育的背景。

1. 中国教育的背景

蒋梦麟认为中国人生活中最核心的概念是本分（duty）。对于中国人而言，生活就是尽本分。至善是生活的最高目标，而至善的含义即要求个体最大程度地尽自己的本分——“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尽本分是获得幸福的唯一途径，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幸福观是社会主义的（socialistic）而非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tic）。与此相关，中国所有的组织和制度都弥漫着在本分中获得幸福的观念。家是父母与子女互尽本分的地方，国是君臣与子民互尽本分的地方，学校则是教授这些本分原则的地方。蒋梦麟引用《孟子》来说明中国学校教育的起源和功能：“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又说“（学校）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滕文公上》）总之，在中国人的生活观念与所有的组织制度中，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尽人伦本分。这是蒋梦麟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教育传统的一个基本判断。

说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在于对人伦本分的强调并不是说中国思想中只有这一维，蒋梦麟把中国传统思想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先秦的创生期，两汉的恢复期，魏晋南北朝印度哲学的引进期，以及隋唐之后儒家思想的复兴期。近代以降西方思想的东渐则被他视为中国思想的新时期，因为从此以后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国，而非单纯中国人的中国。在中国思想史的梳理中，蒋梦麟集中于社

① 就文本而言，《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是蒋梦麟唯一一部系统的教育专著，它既是之前蒋梦麟思考教育问题的思想结晶，也是后来蒋梦麟所有教育思想的出发点。蒋梦麟后来关于教育的论文基本收集于《过渡时代的思想与教育》（1933）、《孟邻文存》（1954）、《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演进》（1962）等文集当中，《西潮》和《新潮》是蒋梦麟的两部自传体著作，其内容不限于教育，甚至主要不是教育。因此，《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是理解蒋梦麟教育思想最重要的著作。

会哲学方面,他认为这是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直接背景,因此,他特别强调中国思想是应解决社会问题之需而推进的。如先秦思想百家争鸣,但其中主要的三大趋向都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主张:南方的自然主义学派,以老庄为代表,主张"无为"、取消社会制度以应时艰;中部的法家学派,以韩非、李斯为代表,主张"刑罚"、建立集权国家;北部的政治—伦理派,上承周孔,下达思孟和荀子,主张道德原则为社会的唯一基础,因此以"礼"应对社会问题。秦建立大一统国家,是法家的胜利,但焚书坑儒,对中国思想造成大灾难,且秦过度刑罚、施以暴政,故而不能长久。汉吸取秦亡教训,从两个方面解决社会问题,政治上,建立一个以儒为主以法为辅的帝国;思想上,采取一种折衷趋势。但总体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魏晋时期,战争频仍,瘟疫横行,人们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而希冀逃离此世,因此许以极乐世界的印度哲学引进中国,沉溺感官享受的快乐主义一度盛行。但快乐主义终究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因此,唐宋以降,迎来了儒家学说的复兴期。唐宋儒学从治国问题出发,发展到知识问题的研究,故而特别关注作为知识核心的理(Reason)。在知识问题上,儒家一分为二,程朱理学道问学、陆王心学尊德性,皆本于儒家的格物致知之说,二者的纷争一直持续到满清。在蒋梦麟看来,这一思想史的脉络构成了中国教育传统的基本背景。①

2. 中国教育的一般范畴

在此基础上,蒋梦麟从教育的定义、程序、目的和问题几个方面探讨了中国教育的一般范畴。关于教育的定义,蒋梦麟取自《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他解释说,万物都有性,性是从天来的。这个万物所共具的性,是按照一定的法则而显现的,这个法则,就叫做道。在人方面,明白了这道理,并自身去体验他,以体验所得,传授于人,叫做教。[5]② 天是一切真理的来源,它显现于物理世界叫天之道,显现于人,叫人之道。人之道显现于人伦——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当中,是谓"天下之达道"。人伦关系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秩序,而且内在于人的德——知、仁、勇,是谓"天下之达德"。如何获得这三德呢?孔子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当"德"展开,适当的人伦关系也就获得了。《大学》说,教育在"明明德"。如何"明明德"呢?儒家提出了一个八条目的教育程序: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中心环节,"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教育的终极目的则在"止于至善",前此已述,至善是由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本分来定义的,即君仁、臣敬、子孝、父慈、友信。论述到此,蒋梦麟特别比较了亚里士多德的至善观念与儒家至善观念的不同。他说,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人

① 蒋梦麟花了较大的篇幅来勾勒这一社会—政治思想史的脉络,详见该书第 5—29 页。

② 另见蒋梦麟的另一部著作《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演进》,台北:世界书局,第 2 页。

的理性;儒家强调的是人的德性。① 又因善治的国家有赖于有序的家庭,而有序的家庭又有赖于受到良好教化的个人。故而,中国教育的目的不仅是道德的,还是政治的,据此,蒋梦麟称,中国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政治—伦理的。中国教育后来的发展,都基于这一基本问题。[6]

(二)中国教育原理

在论文的主体部分,蒋梦麟分别从人性论、学习、教学和道德教育四个方面对中国教育原理进行详尽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蒋梦麟的思想始终"游移于两个方向:投向西方,以斯宾塞和杜威的教育理论以及希腊和罗马的成就为参照;回到中国,蒋梦麟则力图发现中国教育思想中与西方相近和迥异的地方。"[7]在教育思想的相似性方面,蒋梦麟将孔子"因材施教"的格言和杜威主张依据儿童自身能力和兴趣促进个体发展的教育目的观相类比;他认为"在教育上,卢梭的自然主义与道家思想相符,福禄贝尔的发展理论和实践与孟子和王阳明的思想相通,杜威的实用主义与儒家注重经世致用的一般气质相合。"[8]这种比较是为了提请人们注意中国教育传统中的进步观念。但总体上,蒋梦麟认为中西教育传统存在着本质上的和社会学上的区别。

关于中西教育思想的分别,最为显著的地方是蒋梦麟对于科学和道德的讨论。在学习原理部分,蒋梦麟首先从四个方面梳理了中国的知识论传统:(1)知识如何可能?(2)致知的方法,(3)知行关系,(4)知识问题对于教育的意义;进而引导出他关于科学问题的发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曾在五四期间引发过重大讨论,但在 1917 年之前,显然很少人对这个问题本身做学理上的考察。蒋梦麟的贡献在于,他不仅对这个问题做了哲学上的思考,还将其研究的结论与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联系起来。蒋梦麟的进路是从中西思想传统中关于物质世界的观点开始的,他以朱熹、王阳明为中国思想的代表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做比较。他认为王阳明主张回归内心寻找真理的思路与西方现代科学的方向截然相反,可以不论;朱熹虽然主张在物质世界中寻找理(truth),但他的旨趣终究不在物质世界,而是试图通过物质现象所显现的部分线索来寻求整体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朱熹与亚里士多德分道扬镳,亚氏主张"将整体区分为部分,努力地搜索事实,基于历史和科学的证据丰富解释"。蒋梦麟说,将整体区分为不同的部分,并在当中搜索事实,这是以科学方法探索真理的核心过程,这个过程恰恰是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所缺乏的。他继而提出,现代自然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诞生,最重要的

① 在《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演进》一书中,蒋梦麟还说:"柏拉图之学,为修其理智,教以辩证。孟子之学,为修其天爵(仁义),教以人伦。"

原因就有希腊学术的复兴。① 与此相比,程朱、陆王所处的时代也为儒家学术的复兴期,这种复兴与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学术的复兴相比较,有三点重大差别:(1) 中国学术的呈现方式是格言式的,西方学术的呈现方式是系统的;(2) 中国学术的旨趣是追求整体观念,西方学术追求知识的分类;(3) 中国学术在本质上是政治—伦理的,西方学术对自然世界表现出巨大兴趣。蒋梦麟认为,这些方面正是中国至今还未发展出现代科学的主要原因。[9] 在此基础上,蒋梦麟指出了现代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我们再不能让政治—伦理问题占据知识的所有领域,而应该激起我们对自然世界的强烈兴趣。他特别强调仅仅在学校中引进物理、化学等科学的形式还不足以养成科学兴趣,关键在于理解科学的精神,引进系统的实验和观察方法。

在道德教育原理部分,蒋梦麟以中国思想史为背景,对中国道德理论做了详尽的分类研究,但仅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道德教育原理做了专门的探讨,他认为尽管几千年来中国存在多种多样的道德理论,但真正对中国人产生持续影响的只有儒家学派的政治—伦理型道德理论。因此,蒋梦麟特别研究了朱熹、陆九渊和王阳明关于道德行为的观点,朱熹主张一点点地积累和日常践行;陆九渊主张抓住根本,"先立乎其大";王阳明主张道德反省,"致良知"。三者的观点合在一起恰好构成一个完整的道德心理学:王阳明的省察方法可以使人持有一种理性的道德标准,这是形成道德行为的第一步;陆九渊"先立乎其大"的方法可以使人保持一种高尚的道德理想,这是形成道德行为的第二步;朱熹注重积累和践行实际上就是道德行为的完成。[10] 在蒋梦麟看来,儒家学派在道德行为的方法和程序问题上形成的理论堪与现代道德心理学相媲美,但关键的问题还在于道德的理想和标准本身更多地是由社会造成的,而非纯粹心理的。在此,蒋梦麟以杜威的理论为参照,认为尽管宋明理学所追求的"理"(reason)是普适性的,②但个人的经验却因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不同,理性的道德并不仅仅是由内心推理推出来的,它还是由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道德经验的产物。从横向上看,对不同民族的道德标准进行比较研究是将理性道德置于正确基础之上的必要手段;从纵向上看,依据现代社会的要求制定新的道德标准也是重建理性道德的必要步骤。这就需要增加道德社会学的维度。蒋梦麟认为,儒家道德理论的最高阶段是王阳明的理性道德观,但王所强调的省察方法本质上只是一个心理学的方法,在现代社会中,这是不够的,他说:

> 尽管王阳明并不忽视道德的社会学属性,但他从来没有从社会学角度

① 其他的原因还有:对自然的巨大兴趣,研究的新方法,意大利城镇共商活动的刺激等。参见上书第 73 页。

② 蒋梦麟再次引用宋儒陆象山的名言"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为证。这是指导蒋不断地做中西比较的动力所在,这种观念他早在南洋公学时期就形成了;此处更进一步,蒋梦麟在思想史外增加了社会学的维度,为他的新教育主张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 阐述问题。相反,他在相信理(reason)是包治一切道德疾病的万能药这一点上走得太远。然而,不管我们意识到与否,道德观念和方法的变化基本上是由社会力量的变化所导致的。因此,道德理想的重建不仅要基于人的理性能力(rational power),还要考虑到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王阳明已经阐述清楚了道德的心理学问题;我们现在必须接续他四个世纪以前的工作,用现代科学和艺术的方法来阐述道德的社会学问题。[11]

基于上述考虑,蒋梦麟提出中国道德教育的迫切任务是依据现代社会的要求重建道德理想。这里,蒋梦麟同陈独秀、胡适一样,认为家族(family)是传统中国一切活动的中心,国家、学校、钱庄、车间、工厂的活动概不例外,与此相应,中国传统的道德都是以家族为中心的。如中国传统道德的公认标准——诚信和忠恕(honesty and patience):中国人虽然也讲商业诚信、信于友朋、忠于职守,但因此成为传统的牺牲品,缺乏自主性;中国人绝对地忠于自己的友朋,却缺乏对于法人机构(如公共组织和团体)应有的责任感;正源于此,中国人都是忠实的家族成员,同时是冷漠的国家公民和没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这些方面均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在蒋看来,现代社会的道德标准是个人主义、工业主义和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工业主义强调合作精神,国家主义强调个人对于国家的责任。准此,新道德重建的关键在于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培养出能够自主思考和行动的个人;具有合作思维和协调行动的社会成员以及现代国家的公民。这就是中国道德教育的新方向。显然,蒋梦麟关于新道德教育的观点建基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理想型的对垒之上,这就是蒋梦麟道德社会学的基本内容。具体到学校德育当中,蒋梦麟依据杜威的理论,认为学校在德育中的功能是使年轻一代得到训练,让他们过一种与社会阶段相协调的道德生活。他说:"脱离社会的学校是无用的。"学校虽不是为社会形成新的道德理想和标准的地方,但是将年轻一代导向最高的道德理想和标准的地方。

蒋梦麟关于中国教育原理的详尽研究我们没必要再加复述,我们只需要了解他在这种研究中所达到的成就。他一方面通过各个专题的思想史梳理,尽力挖掘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优秀资源;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就各个主题进行中西教育传统的比较研究,他认为这种就任何一个主题的比较,其价值是无可估量的,[12]因为这种比较可以明确中国需要从西方教育传统中吸取怎样的资源。最具特色的是,在思想史的研究之外,蒋梦麟还加上了社会学的思维(他认为这是中国教育原理中一向缺乏的维度),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来分析中国教育传统的利弊得失,以此重建中国教育的新精神。

(三)中国教育的新精神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蒋梦麟逐渐接近他的结论:他提出以积极的个人主义为中国教育的新精神。

1. 中国教育和文化的新资源

在论文的结论部分,蒋梦麟从文化的高度探讨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他说既然教育的目标在丰富人们的生活,那么不能达到这一目标的教育就是失败的。中国传统的生活理想主要强调相互奉献(mutual devotion);蒋梦麟希望中国文化能够从希腊的生活观念、罗马的法律观念、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以及科学和现代知识方法中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使中国人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

蒋梦麟认为,从希腊的生活观念中,中国可以吸收他们强调人的理性能力的幸福观、个人主义的生活观以及重视健全身体和美感的观念,其中个人主义是希腊文化的核心。在蒋梦麟看来,亚里士多德将最高幸福定义为人的理性能力的运用,开启的是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理智传统,这种传统是中国文化所缺少的。中国的道德思想尽管自陆九渊、王阳明以降呈现出理性化的趋向,但理智传统终究没有从道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蒋梦麟最想要引进的是希腊的个人主义生活观,他认为个人主义关涉到整个西方文明的核心,而中国的生活观总体上是社会主义的(socialistic)。此外,蒋梦麟还欣赏希腊健全身体的观念,因为心智与身体的平衡与和谐是形成完美个性的关键。中国人仅将身体看作达到目的的手段、"制造物品"的机器,希腊人则把身体看作一件艺术品。艺术"被视为希腊生活的中心","在宗教、伦理观念、身体发展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美感均不可或缺"。因此,蒋梦麟也赞赏希腊人注重美感的观念。中国应该学习希腊人主张个体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和谐发展的生活观及教育观。从罗马的法律观念中,中国可以学习如何正确处理个人之间的关系。蒋梦麟认为,过去中国人基本上处在礼教和刑罚的双重压迫之下,个人成为社会秩序的牺牲品。相反,罗马法清楚地区分公法和私法领域。蒋梦麟从罗马法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中西秩序观念的不同,而是看到罗马法当中蕴含了中国的礼教和刑罚所缺乏的某种普适性原则。[13]蒋梦麟认为,中国与罗马的法律原则存在三方面的根本区别:(1) 法律的制定者不同:中国由统治者制定刑罚,圣贤制定礼法,罗马法则是由拥有绝对权力的公民制定的;(2) 法律的核心旨趣不同:中国法律强调社会稳定,罗马法律强调私人权利。中国法律的单位是家庭(family),而罗马法律的单位是个人。(3) 中国法律从民族传统中吸收材料,罗马法的形成基于人的普遍经验。罗马法中基于人的普遍理性、个人之间的关系、保护私人权利的原则都是中国法律应该引进的方面。关于基督教的上帝观念,蒋梦麟强调希伯来文明对于西方整个文明发展不可低估的贡献,因为希腊和罗马文明基本上都是个人主义的,西方世界社会观念的发展基本上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发生的。蒋梦麟对基督教持一种中立的态度,他说尽管儒家着重于人伦,基本上排斥超自然力量,但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入,基督教不可避免地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我们的问题不是去拒斥基督教义,而是去理解它们。最后,蒋梦麟特别强调科学和现代知识方法对于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他说,十九世纪西方世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科学与科学方法。现代科学及其方法已经渗透于各

大知识领域和现代西方世界的各项生活当中。现代文明已离不开科学,因此,科学也是中国创造未来繁荣的关键。[14]

应该注意到,尽管蒋梦麟希望从西方各种文明中吸收优秀的思想资源,但几种文明并不是同等重要的,与蔡元培一样,蒋梦麟基本上是一个希腊主义者。[15]他认为,如果说旧中国的统一力量是儒家文化,那么,新中国的统一力量将是希腊文化。因为旧中国只是中国自己的中国;新中国则是世界的中国。政治上,中国已经从专制转到共和;因此,社会上,也应由家长制的社会转为公民型的社会。[16]

2. 积极的个人主义

作为全书的结论,蒋梦麟讨论的是将作为希腊文化核心的个人主义引进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可能性问题。蒋梦麟区分了三种类型的个人主义:消极的个人主义、相对的个人主义和积极的个人主义。消极的个人主义以中国古代的老庄和十八世纪的卢梭为代表,主张排除社会组织的障碍、使个体享受自由的自然状态。老庄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坏的,个体能够享受自由的唯一处所是自然状态。卢梭则说:"出自造物主的东西都是好的,一到人手上就变坏了。""人生来文明,死时却是奴隶。……人的一生无往不在制度的枷锁当中。"相对的个人主义以儒家学派为代表,主张通过强加于个体之上的社会约束调节个体间的冲突,以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目标。儒家学派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待个体,人不是自己的个体,而是父母的儿子,君主的臣民,国人的同胞。《大学》讲:"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但是,修身的主要目的不是个体知识和能力的发展,而是为更好的尽人伦本分做准备。在儒家学派看来,个体在本质上是社会动物,其发展或成长取决于人的社会本能。因此,在中国思想当中,即便个体的发展被强调,个人主义也不过是相对意义上的。① 与前两者不同,蒋梦麟所要引进的积极的个人主义源自希腊世界:区别于消极的个人主义,它不主张通过取消社会组织来保证个体自由,而是主张利用社会制度使个体的本能和能力得到充分发展;区别于相对的个人主义,它不主张个体的创造性潜能成为社会本能的牺牲品。蒋梦麟追溯了积极的个人主义的演进史:它诞生于古希腊时期,在中世纪遭到破坏,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复出,宗教改革时期扩大影响,十八世纪以消极的形式达到顶峰,十九世纪得以回归,之后,积极的个人主义一直被严肃地研究、批判性地检验,并在有机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加以调整。总之,积极的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的巨大遗产,它之所以至今仍是西方现代社会的主导精神,是因为它在承认个体生活

① 蒋梦麟评价说:"相对的个人主义既是中国文明的优点,也是其缺点。强调人的社会属性,稳定的社会得以建立。在中国历史上,尽管中国被外来民族侵略或征服过多次,但社会结构始终保持稳定。这或许是中国至今仍延绵不已,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而古希腊和罗马文明早已消逝的原因所在。但另一方面,当以积极的个人主义(它本质上是希腊文明)为精神的西方文明鼎盛发展的时候,中国文明却停滞不前。"参见上书,第 172 页。

的价值、主张个体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根本观点基础上，还很好地处理了绝对的个人自由与绝对的社会控制之间的平衡。[17] 因此，蒋梦麟特别探讨了积极的个人主义在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上的观点及其对于中国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启示。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蒋梦麟援引现代社会学的观点，认为积极的个人主义已认识到个体与社会并不冲突，而是相互作用，共同导向进步。他引用美国社会学家吉丁斯的观点说，“在先进文明中，个体自由和幸福的持续增长并不与整个民族的利益相冲突”，“种族的维系与进化与个体生活成本减少以及个体自由、能力及幸福的增加比肩而行——即是进步”。因此，社会结构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它所发挥的功能。有助于社会进步的社会结构就是好的，阻碍社会进步的社会结构就是坏的。蒋梦麟似乎以此回应消极的个人主义的观点。

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蒋梦麟意识到西方自身也没有在这一问题达成共识：以密尔和斯宾塞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系强调个体的自由，而以特赖奇克为代表的德国系强调国家的权力。① 不过，在蒋梦麟看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面临着国家防御和国家文化的双重任务：由于中国正处于危险的境地，首要的问题自然是国家防御；同时，由于中国文化中缺乏积极的个人主义的资源，发展国家文化也是第一位的问题。国家防御要求国家团结；国家文化要求个体自由。前者强调国家权力，后者强调个体权利；前者强调组织和效率，后者强调个体自由和自主。官僚制有助于国家防御；民主有助于国家文化。因此，一方面中国需要国家团结、政府权力、组织和效率以及官僚制；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个体自由、个体权利、自主性和民主。蒋梦麟认为，总体上看，这两项任务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因为个体是国家的最终基础，强有力的国家最终取决于强有力的个体：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个体潜能的全面发展，是国家和文明的无上资本。同时，在非常时期，如果国家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个体的自由、权利和自主性都无从谈起。因此，蒋梦麟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通过公共教育体系等手段促成国家防御和国家文化双重目标的达成，他说：

> 国家不仅要保证个体全面发展自己天赋能力的自由，而且，还要提供促成这一发展的充分条件。长久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执行一种放任自由（*laisser faire*）的政策。中国人一直享有不受国家干预的地方自治。我们缺乏个人主义不是由过度的国家权力造成的（相反，政府的权力太少），而是因可称之为礼教的社会传统造成的。现在我们应该让国家介入并促成一种新的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武器是建立公共教育体系。[18]

这就是中国新教育的发展目标，它以积极的个人主义为精神，通过扩展文

① 这种分歧当然是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分歧，蒋梦麟明言：“[密尔、斯宾塞与特赖奇克的]区别只在于个人主义的方法和重点，而不在反对或捍卫个人主义自身。”参见上书，第 176 页。

化、发展科学、个体发展、社会发展、培养公民和训练领袖,承担其新的使命。

三、从积极的个人主义到平民主义

仔细阅读《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会有一个疑问。在全书的第一章,也即论文的导论部分,蒋梦麟提出如下六个方面将对中国思想和教育产生重大影响:1. 希腊的生活观念,2. 罗马的法律观念,3. 基督教的上帝观念,4. 科学与现代知识方法,5. 个体与社会的现代观念,6. 民主的现代观念和方法。[19] 但纵观全书,蒋梦麟只讨论了前五个方面,并最终将中国新教育的精神归结为积极的个人主义。这是一种疏漏吗?

1917 年蒋梦麟回国后,旋即被聘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参与《教育杂志》的编务工作,并在《教育杂志》、《教育与职业》、《东方杂志》等著名刊物上积极发表言论,倡言教育改革。如 1918 年,蒋梦麟在《教育杂志》上连续发表《高等学术为教育学之基础》、《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个人价值与教育之关系》、《进化社会的人格教育》等重要文章,发挥《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的成果,为中国教育献计献策。《高等学术为教育学之基础》(1918.1)试图为中国的教育确立一个科学的学术基础,他将教育的性质定义为全生之科学、利群之科学和复杂之科学。全生(complete living)讲的是教育对于个人应赐予人生完满之幸福;利群讲的是教育应促进社会之进步;复杂科学则指完成教育的个人和社会功能所应具备的学术基础。他说:"离社会则不能言教育,舍个人则更不能言教育。盖个人为教育之体,社会为教育之用。两者兼则教育之体用备。然则何以达此体用乎?曰:此即有赖乎高等学术也。"[20] 这显然是积极的个人主义思想在教育上的发挥和应用。蒋梦麟深信个人潜能的解放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在《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1918.2)一文中,蒋把他所处的时代与纪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时代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相类比,将它们同视为个性大解放的过渡时代。吸收希腊和欧洲近世精神,中国教育应以养成"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为根本目标,定标准,立问题,通新陈交换之理,察社会要需,用适当之方法以推行。其中,蒋梦麟将"社会之自觉"解释为:西洋之文明,根乎希腊之个性主义。个性主义云者,发展个人固有之能力,不使为外界所压迫,养成一活泼强健灵敏之个人是也。西洋修身之基础在乎此。结合多数之个人而成社会,故社会之兴衰,个人之幸福系之。人人对于社会有自觉心,即社会之分子,自觉对于社会负责任是也。此即所谓社会之自觉心也。[21] 同年 4 月,蒋梦麟又发表《个人价值与教育之关系》称,教育有种种问题,究其极,则有一中心问题,这就是做人之道或增进人类之价值。而欲增进人类之价值,当知何者为人类之价值。他说:"欲言人类之价值,当先言个人之价值。不知个人之价值者,不知人类之价值也。人类云者,不过合各个人而抽象以言之耳。……个人之天性愈发展,则其价值愈高。一社会之中,各个人价值愈高,则文明之进步愈速。吾人若视教育为增进文明

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22]其思想仍不出积极的个人主义。6 月,蒋梦麟又发表文章,把积极的个人主义进一步解释为“进化社会的人格教育”。他指出,“何谓人格?本个人固有之特性,具独立不移之精神,其蕴也如白玉,其发也如春日,而此特性,此精神,即所谓人格也。以此为目的之教育,即所谓人格教育也。”进化社会则有三个条件:一、社会所贮蓄之文明,能日日加增;二、社会之度量,能包容新思想;三、大多数人之人民能享文化之权力。要促成进化的社会,就要培养能思、能行的个人,能思是指养成清楚的头脑,能行是指做事担当责任。这样的人格即为进化社会中的人格,他能发明新理而传布之,勇往直前,活泼不拘,居一社会中,能使社会进步;这样的教育即为进化社会中的人格教育。[23]“养成健全的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正是《新教育》的创刊宗旨。

与此同时,蒋梦麟又逐渐用“平民主义”来概括新教育的精神内涵。1918 年 10 月,蒋梦麟发表《世界大战后吾国教育之注重点》,特别地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本质上是“平民主义与武装主义之激战”,平民主义以美国为代表,武装主义以德国为代表。他对美国在战争中的动员能力印象极深:“方美国与德宣战之时,总统以一纸文告,令全国青年自十九岁至二十九岁者,一律注册,预备入伍,一日之间,而全国青年均往就地各机关注册,无敢不到者。他如全国人民,受政府之忠告而节省食物,学校儿童,种植园地以增加食料,及制作绷带以助红十字会,全国实业机关均自愿听政府之调度,以助战争之进行,其预备之神速,运用之敏捷,殊足令人钦佩”。蒋梦麟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之成绩,原因在于美国“有雄伟之经济,健全之个人,进化之社会”,此即平民主义之要素或条件。在此基础上,蒋梦麟开列了一个战后中国应该采用的平民主义的教育方案:(1) 在教育行政方面,“随时随地推行义务教育,以促进社会之进步”;“随地随人施设职业教育、补习教育以增经济之能力”;“推广大学及专门教育,以养成倡导社会进化,加增经济能力之领袖”。(2) 在学校教育方面,“发展个性以养成健全之人格,注重美感教育体育教育以养成健全之个人”;“注重科学以养成真实正当之知识”;“注重职业陶冶以养成生计之观念”;“注重公民训练,以养成平民政治之精神,为服务国家及社会之基础”。[24]

1919 年 1 月,蒋梦麟发表了著名的《和平与教育》,更加明确地阐明了“平民主义教育”的内涵。在文中,蒋称中国和平之基础一向建筑于并不牢靠的牧民政治之上:

> 国民如群羊,仁君牧之,牧之得道,则五谷丰登,家给户足,熙攘往来,咸与升平。虽然,仁政之下,暴政伏焉;牧之始,鱼肉之始也。彼牧者一旦苟欲杀其群羊而供其大嚼,则又谁与之抗!读吾国历史,一治一乱相乘续者无他,羊肥而食,食者暴也;羊瘠而牧,牧者仁也。牧而食,食而牧,循环不已。政府以民为羊,而民亦自甘居于羊之地位。若是者数千年,积重难返。[25]

与此针锋相对,蒋梦麟提出平民主义的概念:

> 牧民政治之反面,即平民主义是也(或曰民权主义)。平民主义,首以增进平民之能力知识为本,使人民咸成健全之个人,倡造进化的社会。于是一方以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而为和平之保障;一方以个人之才智,社会之能力,而扫除强暴不良之政治。如此,则熙攘往来,咸与升平,真正之和平至矣。[26]

平民主义虽与牧民政治相对,但在蒋梦麟看来,平民主义不仅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它与积极的个人主义的含义是相通的,其范围涵盖整个社会,毋宁说,平民主义是蒋梦麟对整个新时代的判断。蒋梦麟曾在《改变人生的态度》一文中,直接把二十世纪称为平民主义的时代,与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十九世纪的科学时代相对照。[27]在此基础上,蒋梦麟将这一对概念应用到教育分析上来:

> 吾国昔日之教育,牧民政治之教育也。孟子曰:"立庠序之教,所以明人伦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近世西洋之教育,平民主义之教育也。曰自治也,独立也,自由平等也,发展个性,养成健全之个人也,皆所以增进个人之价值,而使平民主义发达而无疆也。此次世界大战之结果,平民主义已占胜势;世界潮流,日日趋于平民主义。[28]

可见,五四期间蒋梦麟所反复倡言的平民主义教育的本质内涵与他在《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中所提出的"积极的个人主义"是一致的。如在紧接着发表的《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1919.2)一文中,蒋梦麟更直言:"[平民主义]对社会国家而言,曰个人主义。平民主义所主张之自由平等,即保障个人之说也。对文化教育而言,曰个性主义。发展个性,养成特才,则文化得以发达。"[29]换言之,教育民主主义即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它与"积极的个人主义"几乎可以说是名异而实同。

四、新教育运动的推动者

五四运动期间,中国教育界最为重要的改革无疑是由《新教育》同人发起的新教育改革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蒋梦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918 年 12 月,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暨南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成立"中华新教育社"(次年改名"中华新教育共进社"),鼓吹新教育改革,揭开了五四时期新教育运动的序幕。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新教育共进社,是民间教育力量的一次大集结、大整合,它最初的五大机关成员均是中国教育界的重镇;新教育共进社的成立的第二年,又有南开大学、北京高师等组织加入,使其成员扩展为 11 个,成为当时继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下面简称"全教会")

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后最有影响力的教育社团。该社以“直接输入东西洋学术，使吾国故有文化，受新潮之刺激而加速其进化率”为宗旨，起初以发行新教育丛书和新教育杂志为其主要工作，预定该社 3 年内出丛书 18 册，并详细开列了丛书目录，但因五四风潮乍起，该计划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因此，新教育共进社真正得以实施的常规工作是《新教育》杂志的出版发行。[30]

《新教育》正是以蒋梦麟为主干，编辑代表及作者群体汇聚了当时教育界的领军人物，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胡适、陶孟和，南京高师的郭秉文、陶行知、朱进、刘伯明，江苏省教育会的沈恩孚、贾丰臻，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余日章、顾树森，以及暨南学校的赵正平、姜琦等；北京高师从 2 卷 1 期起也加入了《新教育》的主办工作，编辑代表有陈宝泉、邓萃英、何炳松等人。蒋梦麟在这个团体中占有重要位置，一方面，蒋在“新教育共进社”成立之前是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重要成员，后来又做北京大学的教育学教授和代理校长，这些得天独厚的身份条件使他成为沟通、整合南北教育资源的中枢人物；另一方面，蒋在主编《新教育》期间，在该杂志上发表大量的重要文章，其平民主义教育主张得到了充分的阐发和普及，使他成为整个新教育改革运动的实际的、当然的理论家。借助《新教育》这一阵地，蒋梦麟得以尽情发挥他的教育主张，为五四时期的新教育运动确立思想基调。1919 年 2 月，《新教育》创刊号上蒋梦麟发表的《新教育月刊创设之用意》可读作该刊宣言：

> 同人等察国内之情形，世界之大事，深信民国八年，实为新时代之新纪元。而欲求此新时代之发达，教育其基本也。爰集国中五大教育机关，组织新教育共进社，编辑丛书、月刊，盖欲在此新时代中，发健全进化之言论，布正当确凿之学说。当此世界鼎沸，思想革命之际，欲使国民知世界之大势，共同进行，一洗向日泄泄沓沓之习惯，以教育为方法，养成健全之个人，使国人能思、能言、能行、能担重大之责任，创造进化的社会；使国人能发达自由之精神，享受平等之机会。俾平民主义在亚东放奇光异彩，永远照耀世界而无疆。

与此同时，蒋梦麟还通过提交议案的方式直接影响教育决策。1918 年，教育部成立了由众多教育专家贤达组成的教育调查会，该会直接对教育总长负责，调查审议教育上之重要事项，以为教育改革做准备。① 教育调查会第一次开会期间，蒋梦麟和沈恩浮向会议提交了一个“教育宗旨研究案”，称“欧战之后，

① 教育调查会包括教育行政调查股、普通教育调查股、师范教育调查股、高等教育调查股、社会教育调查股及实业教育调查股六个分部，其成员主要由蔡元培、范源濂、汤尔和、王宠惠、蒋维乔、吴稚晖、陈宝泉等教育界名宿及高级教育行政人员组成，除此之外，还包括蒋梦麟、沈恩浮、陈润霖等民间教育界的教育专家。蒋梦麟在其中承担了普通教育调查股、师范教育调查股和高等教育调查股三部的调查任务，这种身份的获得无疑是他将《新教育》的主张“上传”的重要渠道。参见朱有献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90—391 页。

军国民教育不合民本主义，已为世界所公认”，“我国教育宗旨亦应顺应世界潮流有所变更”。在这一议案中，蒋和沈提出，民国成立以来，中国之所以祸患迭乘，原因在于国民缺乏共和精神，因此，新的教育宗旨在于发展共和精神，“以固国本”。而发展共和精神的关键又在于培养健全人格的共和国民，因为具有健全之人格的国民“方足以担负社会国家之义务”，“故养成健全之人格实为共和国之基础。”在此基础上，蒋、沈提出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新的教育宗旨，并附以如下说明：

所谓健全人格者，当具下列条件：
（1）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役社会国家之本；
（2）人生所必须之知识、技能；
（3）强健活泼之体格；
（4）优美和乐之感情。
所谓共和精神者：
（1）发挥平民主义，俾人人知民治为立国之本；
（2）养成公民自治之习惯，俾人人能负国家社会之责任。

比较这一宗旨与《新教育》创刊号的平民主义宣言，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本质上的一致性：健全人格的四项条件实际上是从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对“养成健全的个人”作出具体说明，而所谓共和精神，其内容根本就是“平民主义”，它特别强调健全的国民是国家社会之本。因此，这一主要由蒋梦麟起草的宗旨案体现了五四期间教育界试图以民主主义精神改革中国教育的总体倾向。该宗旨案立即获得教育调查会的通过，一面陈请教育部公布，一面由《新教育》和《教育杂志》发表，“备全国教育界之研究，以觇舆论之趋向”。该文发表之际，适逢杜威访华，《新教育》出杜威专号，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更趋普及。不久，全教会将教育调查会的宗旨案列入讨论，一场以教育民主主义为精神、以学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新教育运动渐次展开。

1919 年 4 月 30 日，杜威一行抵达上海，蒋梦麟与胡适、陶行知三位弟子亲往迎接。5 月 3 ~ 4 日，他在中国发表的头两场演说就以“平民主义的教育”为题目。此后在中国两年多时间里，杜威发表长短演讲 200 多次，其中一半以上的内容都是关于教育方面的，即便他关于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演讲，最后也往往归结为教育。在这些演讲中，“平民主义”甚至是比“实验主义”更为常见的关键词。可以说，杜威给予中国最实质的建议就是一套民主主义的教育主张，这套主张宣称教育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教育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唯一工具”；宣称共和的国家就是要实行平民主义的国家，必须有平民主义的教育；平民主义教育的精髓在“发展个性的智能”和“养成共业的习惯”；平民主义教育的内容包括“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是经验的不断改组改造”、“学校即社会”、“以儿童为中心”、“从做中学”等；平民主义教育的方法包

括“注重生活教育”、“注重学校与社会的关联”,“注重儿童的兴趣和个性”等等。这些内容无疑是对《新教育》所确立的教育民主主义精神的支持与深化,杜威思想经过中国教育界进一步的解释和传播①,很自然地成为新教育运动的指导。

1919 年 10 月 10 日,全教会第五次会议在太原举行。这次会议成果颇丰,通过了《请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改革女学制度案》、《推行义务教育案》、《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革新学校教育方法案》、《中小学教科书应即改编案》、《普通教育应注重职业科目及实施方法案》等决议案。其中,这次会议通过的《请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意义重大,这一议案的原件正是蒋梦麟、沈恩浮在教育调查会提交过的,本次会议的讨论是为征求全国教育界的舆论。该议案提出:

> 新教育之真义,非止改革教育宗旨,废止军国主义之谓。若改革现时部颁宗旨为别一种宗旨,废止军国主义为别一种主义,仍是应如何教人之问题,非人应如何教之问题也。从前教育只知研究应如何教人,不知研究人应如何教;今后之教育应觉悟人应如何教,所谓儿童本位教育是也。施教育者不应特定一种宗旨或主义以束缚被教育者,盖无论如何宗旨、如何主义,终难免为教育之铸型,不得视为人应如何教之研究。故今后之教育,所谓宗旨,不必研究、修正、或改革,应毅然废止。本年北京教育调查会研究结果,有“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二语,经本会讨论,认为适合教育本义,非宗旨之改革。[31]

改“教育宗旨”为“教育本义”,由“如何教人”到“人如何教”,这些方面反映了杜威“教育无目的论”、“教育即生长”以及“儿童中心论”等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则是对《新教育》同人所确立的教育民主主义精神的进一步确认。全教会通过的这个议案虽然没有正式颁行,但其精神实际上已成为中国教育界的共识,并对后来全面的学制改革起了某种先导作用。

杜威于 1921 年 7 月结束他的中国之行,杜威回美国后,中国的新教育运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步,相反呈现出进一步发展的态势。继杜威之后,以范源濂为首的中国教育名宿又专门组织了实际教育调查社,邀请孟禄到中国作调查和讲学。孟禄的教育调查由陶行知等人陪同,为期 3 月,行踪所及,凡历九省,调查学校、机关 200 余处,讲学 60 余场,调查范围涉及方方面面,这些教育活动无疑对新教育运动起了极大的深化和促进作用。孟禄在教育调查的基础上对于中

---

① 除《新教育》外,杜威在华期间,还有很多杂志以宣传杜威思想为志业,如最富盛名的《教育杂志》和销路广泛的北京《晨报》,这些杂志几乎记录了杜威所有的在华演讲。另外,在杜威的影响下,还直接产生了一些以平民主义为宗旨的刊物,北京高师的《平民教育》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实践层面,中国所有的高等师范学校和大学教育系所都将《民主主义与教育》用作课本或参考书;中小学则以杜威的思想作依据,甚至直接开办杜威学校,进行教育实验。这些方面极大地扩大了杜威教育学说的影响,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也随之得到了普及。

国教育的建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中首要的一点就是主张中国教育应“取平民主义”。

实际教育调查社完成孟禄的教育调查后,于 1921 年 12 月,与新教育共进社和《新教育》杂志社合并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继续推行新教育改革运动。其时,蒋梦麟已赴美参加华盛顿会议,陶行知当选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任干事。该社与全教会合作推动壬戌学制的制定,其教育标准仍然体现了蒋梦麟的教育思想。

“壬戌学制”继承全教会第五次会议的思想,不立教育宗旨,只列七项标准,以把握教育之本义:(一) 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 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 谋个性之发展;(四) 注意国民经济力;(五) 注重生活教育;(六) 使教育易于普及;(七) 多留地方伸缩余地。① 综观这几条标准,可以说基本上是对蒋梦麟等新教育同人所极力倡导的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展开说明。如第一条“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与第三条“谋个性之发展”,合而观之,就是《新教育》的创刊宗旨“养成健全人格,创造进化社会”。这两点反映了蒋梦麟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在蒋梦麟看来,一、三条正是第二条“发挥平民教育精神”的核心内涵,而第六条“使教育易于普及”,是强调民主主义教育精神的平等维度。第五条“注重生活教育”,是杜威“教育即生活”思想的体现。实际上,在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中,“教育即生活”也是与“谋个性之发展”、“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相通的;如果说“谋个性之发展”、“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是新教育的原则或目标,“注意生活教育”则是达成这些目标的基础和方法。标准的最后两条:(四)注意国民经济力和(七)多留地方伸缩余地,讲的是办教育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照顾到各地办学能力和不同需要。这是应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实情而提出的标准,从理论上讲,唯有照顾到地方的个性,才能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个性的人,符合这些标准的教育才是民主主义的教育。以上述要点为标准,《壬戌学制》制定了一个完备的“六三三”学制,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制度。

至此,五四时期的新教育运动经由民间的倡导、启动、推进,最后促成了国家教育制度的出台,蒋梦麟积极地推动这一过程的进展,其教育思想也因此得到逐步落实。②

---

① 《大总统颁布施行之学校系统改革案》,《政府公报》第 2393 号,1922 年 11 月 2 日。

② 当然,蒋梦麟早期教育思想的落实仍然是有限制的,大体上讲,五四期间自由主义学人的教育改革主张停留在上层政治及精英教育层面,蒋梦麟的教育主张也不例外。事实上,到 1922 年,蒋梦麟面对新教育运动所遇到的困境发出了近乎绝望的感叹:“我们办教育的人,近来真觉得日暮穷途了。”(《北京晨报副刊》,1922 年 12 月 2 日)也正是这一年,陶行知新教育运动的主要工作,很快完成了从精英的民主主义到大众的民主主义的转向。不过,即便 1922 年之后中国教育精神的总体方向有些转变,也不能因此而忽视蒋梦麟早期思想的重要意义。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 Hubert O. Brown, *American Progressivism in Chinese Education: The case of Tao Xingzhi*, Selected from Ruth Hayhoe, Marianne Bastid, *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Armonk: M. E. Sharpe, Inc, 1987, pp. 120—136;也可参见熊春文博士论文《教育民主主义的兴起——民初教育精神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5 年 5 月,第 102—107 页。

结论:过渡时代的思想与教育

综观蒋梦麟的早期思想轨迹,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要点,其一是他逐渐获得的平民主义的核心教育思想,其二是他借以获得这一思想主张的一以贯之的社会学思维。平民主义的教育主张实际上在《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中已经初具雏形,只不过在那里表达为"积极的个人主义"。在这部奠定其思想基础的著作中,蒋梦麟认为,虽然中国古代的教育家(尤其以孔子、孟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在很多问题上形成了可与现代原理相媲美的认识,但这些认识充其量只能称之为教育心理学,而缺乏教育社会学的维度。因此蒋梦麟主张,必须在中国的教育传统当中加上社会学的维度,才能开启出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教育精神。准此思路,蒋梦麟对于中国教育原理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并切实地提出他的建议。例如,在道德教育方面,蒋梦麟提出中国的迫切任务是依据个人主义、工业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道德标准,重建中国的道德理想。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工业主义强调合作精神,国家主义强调个人对于国家的责任,这些方面都是现代社会所要求的道德品质;其中,个人主义(确切地讲是"积极的个人主义")最重要。个人主义原本是希腊文化的核心,后来发展为整个西方文明的根基及现代社会的精髓,在蒋梦麟看来,它以后一定要发展为中国教育的新精神。至此,或许有人会认为蒋梦麟在处理古今中西问题上不免显得简单,因此,当蒋梦麟刚回国之际常常踌躇满志地宣讲希腊文化,却被一个报纸以漫画讽刺。在那幅漫画中,一个戴博士方帽,面庞消瘦的人,满口吐出来的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两个西洋名字在空中荡漾。①

但是蒋梦麟所诉诸的不是简单的西化派的理由,而是具有更加审慎的社会学理据。因为他认定"旧中国只是中国自己的中国;新中国则是世界的中国。"[32]个人主义也不仅仅是西方的个人主义,而是世界的个人主义,现代社会根本上是个人主义或平民主义的时代。如蒋梦麟在论及为什么要以个人主义为中国教育的新精神时,提出的正是一个社会学的解释,他说:"我国旧时之社会,由家族结合之社会也,故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为群。今日文明先进国之社会,由个人结合之社会也,故合尔、我、他,各个人而成群。以家族结合之社会,其基础在明君、贤臣、慈父、孝子。由个人结合之社会,其基础在强健之个人。"[33]而"中国自与西洋文明接触以来,旧道德之势力渐减(我国之旧道德,以家属为基础)。工商业日兴,交通日便,而家庭之势力日薄,个人主义渐渐露其面目。势将愈趋愈甚,非数辈旧道德家所得而抑制之,亦非数册旧道德书所得而防止之。"[34]换言之,蒋梦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人伦为基础

① 关于这一段逸事的详细叙述可参见《一个富有意义的人生》,《传记文学》4 卷 3 期;也见马勇《蒋梦麟教育思想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1 页。

的家族社会,而现代社会以强健的个人为基础。从儒家的政治—人伦传统中不仅开不出作为现代社会之基础的个人主义,而且儒家的五伦思想及其所辩护的从家族到帝王将相的等级制度还是中国迈向现代社会的障碍。但既然中国已经踏上了现代化的征程(尽管是被动的),以个人主义取代家族主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蒋梦麟极力主张以个人的尊严来代替孔子的五常。他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要施以尊重个人价值的新教育,他明确指出儿童从开始受教育起就应该发展他的个性,这种健全的个性所形成的社会化的个人主义,对实现自由平等的现代民主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35] 同当时陈独秀和胡适的思维方式非常相似,蒋梦麟认为中国之所以要取个人主义为新教育的精神,也是由中国正从家族社会过渡为现代社会的原因造成的。

五四期间,蒋梦麟把积极的个人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平民主义,并从各个方面发挥其主张,为新教育运动提供思想武器和舆论基础。后来,蒋梦麟将这段时间的言论结集成册,命名为《过渡时代的思想与教育》。在该书的开篇部分,蒋梦麟对他所处的时代有一个绝好的描绘:

> 吾国近二十年来,经过种种变更,欧化横来,文明之基础动摇。其变故之大,兼希腊中古与十八世纪三大时代而共之。……思想错杂,学术衰微,民智昏蒙,尊孔复辟,欧化共和,吾民其知之否乎?此就政治言也。若就社会言,家族主义渐破,个人主义日益萌芽,习惯之道德渐衰,个人之道德尚无标准,怒潮汹涌,荡舟其中,回望故乡,已出视线,前望彼岸,杳无所见,中国之前途,其谁知之?其谁知之?[36]

蒋梦麟将这种基础动摇、全面变故的时代命名为“过渡时代”,过渡时代就需要有过渡时代的教育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蒋梦麟的教育思想之所以能够在当时获得这么多的认同,并逐步得到落实,正源于他准确地回应了时代的问题和精神。准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蒋梦麟所倡导的教育思想的深刻价值,对于他的教育言论才不至于过于轻忽。

参考文献

[1]　胡适. 胡适学术文集·教育[C]. 北京:中华书局,1998:131.

[2][3]　蒋梦麟. 西潮·新潮[M]. 长沙:岳麓出版社,2000:61,80—81.

[4][5][6][9][10][11][12][14][16][17][18][19][32]　Chiang Monlin. (1918). *a study in chines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 31, 31-36, 77, 147-148, 148-149, ii, 154-168, 167, 176, 181-182, 30, 167.

[7][13][15]　Albert Borowitz. (1963). Chiang Monl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Education 1917 ~ 1930. Selected from Chiang Monlin. *Chinese culture and education: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survey*. Taipei: World Book Co., Ltd., 8, 9, 8.

[8]　Chiang Monlin. (1963). Chinese culture & education as seen fifty years later, Selected

from Chiang Monlin. *Chinese culture and education: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survey*. Taipei: World Book Co., Ltd. 8.

[20][21][22][23][24][25][26][27][28][29][33][34][35][36] 蒋梦麟. 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197, 21, 99—103, 104—106, 295—307, 107—108, 108, 25, 111—112, 50, 100, 9, 102, 3—16.

[30] 朱有瓛等.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G].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308.

[31] 璩鑫圭等.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G].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844—845.

(责任编辑 沈文钦)

"普通知识"与"高深知识"

钦 文

我们发现,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中,知识都可以划分为"普通知识"与"高深知识",而且两种知识的划分在从古到今的教育思想中均能找到依据。

在古希腊,paideia 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即被视为普通知识与高深知识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柏拉图指出,音乐、体操、算术、几何、代数、天文学、和声学都不是最终的目的,它们只是辩证法学习的"前奏",是预备性的科目。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代表了形而上学的一面,是保留给少数人的,而 paideia 则是大众化的。

在古罗马,西塞罗将知识分成基础修养(puerilis institutio)和高级修养(Politior humanitas)两大部分,前者几乎与 liberal arts 意思相同。在中世纪,七种自由学科(the seven liberal arts)被视为通往更高智慧(神学、哲学)的预备科目,"三艺"、"四科"的本义即为通往智慧与真理的"三条道路"与"四条道路"。

十九世纪的英国教育家马克·帕蒂森指出,在所有的学习科目中,都存在基础(elementary)和高深(higher)之别。基础的部分可以以规则(rules)的形式来教条式地加以讲授,在跨越基础教学阶段之后,我们便进入了高深学问的领域,比如自然科学中的实验与发现,道德科学中的思辨等等,这些是高等教育的关键组成部分。基础知识中的基本元素、规则是通向高深知识的道路,但如果一个人要踏上探索高深知识的道路,他必须超越规则,人一旦结束基础性教育、进入高等教育的领地,"你就进入了一个薄雾弥漫、模糊不清的地域,在这里,基础的知识已经被超越,所有的一切都是朦胧的,无法定义的。一切都是猜测,而且这些猜测只能为那些从未涉足此地的人所思考"。